

Q & A

發言一：

各位的談話讓我受益良多，尤其張世雄教授最後提到要從全球化的核心價值裡，彰顯專業倫理的重要，並瓦解商業利益的糾葛，我深感同意。然而，全球化使得倫理的建立遭遇更多困難的因素，譬如黃崑巖教授主張小孩從兩歲起，就應該開始培養基本倫理觀念，未來自然會有專業倫理，但是大人本身可能沒有倫理，或者太忙碌無法顧及家庭教育，加上小孩可以輕易得知各式各樣的媒體訊息，倫理的建立顯然愈來愈不容易。因此在一些大家都認同的大原則之下，具體的做法為何，仍是我們非常困惑的問題。

發言二：

沈美真律師提到「慈悲」與「平等」的重要，我也認為追求包容社會必須從慈悲與平等出發。至於林萬億教授指出「支持市場但不擁抱財團」的觀點，我非常同意，但是政府

為吸引跨國企業投資，必會釋出優惠條件，甚至最大幅度的減稅，以期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，創造經濟價值。在此前提下，該如何避免對公與義的傷害？

張世雄回應：

林孝信教授提出「怎麼辦」的問題，我以荷蘭的經驗來舉例，它的成就之一是「工時下降」。工時下降、工時分享不必然最好的策略，因為市場容易對於part-time job產生歧視，但是荷蘭卻能扭轉這種成見，視part-timer有完全的工作身分。這項重要的改變，提供part-timer基本社會保障，這就是討論勞動市場彈性化時，為何一定要配合社會福利考慮的原因，社會福利與勞動政策兩者就此也合一起。接下來，我們更進一步要問的是：剩餘時間做什麼？它對家庭影響為何？為什麼它能創造較接近平等的家庭關係？最直覺的想像除了家庭功能可能提升之外，它對男、女工作者的角色定位，或許也會出現新的思考。

至於勞委會取經於歐洲，推動「第三就業系統」，我想不是不好，但因台灣與歐洲的社會處境不同，使得公共就業方案在台灣深受批評與質疑，一些參與公共就業的人，也被嚴

重污名化。舉例而言，很多鄉下地方的公共就業，其實根本沒有空間，或沒有適當的人選能夠投入，因此許多負責規劃公共就業事務的鄉鎮公所，認為這個政策徒增負擔，新人什麼都不會，甚至沒事做，政府唯一的目的只是帳面上降低數字，完全沒有配套措施。所以我的說法是，台灣社會福利之所以會承受這麼大的污名，其實與政府濫用金錢、方案，任意把人塞進某些單位，但是從來不去檢討效益有關。也由於這套公共就業方案做得更糟，大眾自然對社會福利有所誤解，所以政府又以此為藉口，回過頭來說大家都不喜歡，還是決定經濟優先，公共福利暫緩。

黃崑巖回應：

對於「重視專業倫理與弱勢權益」的主題，如果個人、社會、專業都有倫理觀念，我認為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自然會形成。例如現在有一顆可供移植心臟，但有三個等待換心的病人，到底誰該先得到？在考量這個問題之際，如果倫理意識不夠健全，不可能會有答案，因為公共辯論很容易會演變成各說各話。林語堂在《生活的藝術》書中清楚提到，人

類道德勇氣的主要來源是閱讀。以家庭教育來說，我也認為培養倫理最重要的管道在於閱讀。而林孝信教授投身於社區大學相關工作，我更建議可以將最主要的目標，放在建立學生喜歡唸書的習慣上。不過無論如何，孩子的人格養成，不能把所有責任通通交給學校，如果家中父母不配合學校教育，灌輸孩子混淆的價值觀，最後教育一定會失敗。

另一方面，我認為全球化最徹底、最早的場域是「醫學」，因為疾病無國界，醫生治病的時候不能區分膚色、國籍、貧富、地位、性別等。但是從另一個例子來看全球化議題，我感到有些失望：老布希在一九九二年參加全球環境高峰會議期間，發表談話指出「什麼都可以談，但美國人的生活不能談」，顯然是將美國利益置於最上層；後來經過環保團體辛苦遊說，柯林頓終於參加京都協議，沒想到小布希上任後，馬上宣佈退出，表示無法為全世界的環境負責，這又是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的做法。事實上，美國人口佔全球五%，排廢氣量為全球三〇%；印度人口佔全球十七%，排廢氣量只有五%。美國悍然退出京都協議，毫無倫理觀念可言；如果國際之間都沒有倫理觀念，每個國家必然也不會重視倫理。

林萬億回應：

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簡單提出五點回應：一、我的文章最主要的用意，是提醒大家無論處於工業社會或全球化社會，倫理非常重要。二、制度的建立也非常重要，否則倫理的追尋將淪為一場空談。三、制度建立的過程，一定要先尋求觀念上的共識，無論同情、慈悲、平等，只要有助人類倫理推展都應該提倡。四、只透過制度、觀念，卻沒有一套深入、普及的公共論述，一切都不可能成功。包括政府與財團、政客與財團之間的關係，如果缺乏大家的了解和監督，同樣很難導向正軌。五、我們也要了解到，在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，必須接受某種成本的傷害，不然想要從全球化中得到任何好處，都是妄論，這是天下沒有免費午餐的道理。

社會學領域的人都了解，一九八〇年代有「把國家帶回來」的潮流，但近二十多年來，全球化又將國家瓦解掉，不過我預測，幾年後國家又會重新回來。一如黃崑巖教授所言，美國都在守護它的國家，我們何必放棄國家任人蹂躪？這是笨蛋的做法。我不相信美

國會保衛、關心別人，國家到頭來還是要靠自己保護人民。至於張世雄教授提到政府對社福的污名化，我想政府沒有那麼聰明，也許不用把它想像得那麼陰謀。

最後要說明的是，我在文章中對全球化提出許多正反辯論，只是希望做比較清楚的交代；此外有關倫理的養成，我和黃教授的態度比較一致，也認為需要努力從教育著手。雖然這有點老生常談，教育本身也有力有未逮之處，但是離開教育，恐怕難以治本。所以我們必須重整教育內容，不僅要反思全球倫理，也要注重在地倫理的議題。

黃越欽結論：

我認為全球化的功過很清楚，每每討論都是撻伐不斷，不必多說。對抗以美國資本主義為主導的全球化達爾文思想，其實有區域組織化的策略與技術。例如歐聯不是只有「把國家帶回來」或「為歐聯而歐聯」，它是透過區域組織的策略，對抗以美國勢力為主的WTO新秩序。又如亞洲除了日、韓之外，從西伯利亞到南沙群島，包括中共在內通通已納入ASIAN組織，單單台灣在此時是背其道而行，這是非常危險的狀態。

其次，倫理與專業倫理不是教育可以單獨達成。直言之，我們的社會像是缺了一塊「規範」的拼圖，缺乏良好的「行規」，就沒有良好的「行會」和「行尊」，於是專業論理也非常欠缺。反觀世界各國，他們的律師並不是考試出身，而是採用學徒的概念；國外工程師、醫師、建築師的行會勢力龐大，行規也有很強的紀律，但在台灣都是通過考試形成專業認證，行規被國家吸收了，卻沒有能力出來維持。舉例來說，教授論文抄襲、律師當黃牛、醫師收紅包，原本都是行尊、行規、行會的事情，一旦缺乏行尊、行規、行會，當然沒有所謂的專業倫理。我想，面對這些問題不能繞圈子，如果沒有一針見血，台灣社會的進步絕對有限。